

面向非洲的我国职业教育对外开放政策研究

汪欣欣,丁恒馨

(南京工业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江苏 南京 211816)

摘要:职业教育对外开放政策工具是实现中国职业教育“走出去”目标的重要方法和手段。通过对2004—2021年间我国职业教育对外开放政策文本中的政策工具进行计量分析,发现我国职业教育对外开放政策较好地契合了非洲国家职业教育发展中的需求,包括发挥强制工具作用,促进职业教育现代化;健全规制工具体系,探索职业教育标准化;多样化混合型工具,构建职业教育生态链;凸显市场工具效用,提升职业教育认可度。未来我国对非洲职业教育开放政策可进一步提升强制性工具精度,平衡政策工具特性,拓展政策工具主体,以更好地落实语言互通、创造就业机会,以贡献职业教育中国方案。

关键词:职业教育政策;职业教育对外开放;政策工具;非洲;“一带一路”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290(2022)0030-0052-08

近年,我国职业教育对外开放工作逐步深化,中非职业教育合作也愈加频繁。随着中非合作论坛机制走向成熟,中非教育合作走向纵深,中非职业技术教育合作已经成为助力非洲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的新动力^[1]。2019年11月,为促进中国与非洲其他国家职业教育合作和交流,助力“一带一路”建设和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中国—南非职业教育合作联盟”更名为“中非(南)职业教育合作联盟”,这种变化说明中非职业教育合作国家数量增加,合作范围得以拓展。但是,部分“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的职业教育发展不均衡,往往难以支撑产业一线对高素质高技能人才的需求^[2]。针对非洲各国职业教育发展不均衡的问题,我们有必要了解相关国家或区域的职业教育政策现状和需求。在此背景下,本研究基于政策工具视角,针对非洲职业教育发展中的需求与困境,对我国职业教育现行的对外开放政策进行考察分析。

一、非洲职业教育发展需求及困境

(一)非洲职业教育发展需求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数据,非洲撒

收稿日期 2022-08-19

基金项目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语体视角下的汉语逻辑结构标记计量研究(项目编号:19YYC002,主持人:汪欣欣);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2022年国际中文教育研究课题一般项目 面向国际中文教育的非洲四国跨境语言政策研究(项目编号:22YH18C,主持人:汪欣欣)

作者简介:汪欣欣(1986—),女,博士,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国外教育政策、汉语国际教育;丁恒馨(1996—),女,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国外教育政策。

哈拉以南地区的青年失业率超过15%,贫困国家中25%的青年无法完整阅读一句话^[3]。《非盟2063年议程的第一个十年执行计划》^[4]的愿景就包括“建设一个以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为基础的繁荣非洲”,其建设资金用途之一是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资并重点发展技术职业教育与培训以及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等学科,吸收中学毕业生以支持科技创新推动的技能革命,足以证明职业技术教育的重要性。据《2063年议程》(Agenda 2063: The Africa We Want)^[5],预计到2023年,在未能进入高等教育机构就读的非洲学生中,至少七成有机会参加技术职业教育与培训课程。到2030年,所有未接受高等教育的中学生都可以免费接受职业教育与培训,这说明在非洲接受职业教育是一种可以提升生活水平和质量的重要渠道。虽然职业教育在非洲的重要性十分明显,但是发展缺口非常大,仅以南非为例,根据南非发布的《学后教育和培训监测:宏观指标趋势(2021年3月)》(Post-Schoo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Monitor: Macro-Indicator Trends)^[6]中的数据,尽管从2010年到2019年,南非职业教育入学人数几乎翻了一番。但为了实现《南非国家发展规划》中的计划,从2019年到2030年间的入学人数平均年增长率需要每年翻一番才能实现目标。

(二)非洲职业教育困境

在非洲各国中,南非是非洲地区职业教育体系较为完善的国家。近年来,我国与南非的职业教育合作也取得了一定进展。2019年12月16日,南非鲁班工坊揭牌仪式在南非德班理工大学隆重举行,这为我国与其他非洲国家的合作提供了样板。《南非职业教育培训2020—2025战略规划》(Revised Strategic Plan: 2020—2025)^[7]指出,在过去的25年中,南非的职业教育系统发展迅速,并且经历了艰难的转型过程,职业教育机构都相对年轻且需要扶持。该计划也指出南非的职业教育体系面临以下问题:(1)民众对职业教育的认可度较低;(2)基础教育阶段与职业教育阶段缺少贯通;(3)公办职业院校的学生很难获得真正基于工作场所的实践学习(Workplace-based learning, WBL)机会;(4)学习项目和资格认证不匹配现实需求;(5)资格认证考试存在证书发放延迟等问

题;(6)缺少学生支持服务;(7)专业教师缺口较大;(8)教学方式和教育科技相对落后。上述问题在非洲其他国家也比较普遍。

基于以上背景,本研究针对非洲职业教育发展中的需求和困境,对我国职业教育对外开放政策进行分析,观察其在中非职业教育合作中的效用以及存在的问题。

二、职业教育政策分析框架

(一)我国职业教育开放政策文本来源

我国职业教育政策主要来源于政府部门制定和发布的相关文件。本研究中的政策文本主要选自中国政府网、教育部官网、外交部官网、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官网、中国“一带一路”网,另外还关注了江苏省、山东省、浙江省、甘肃省、上海市、天津市等省份的政府和教育部门网站。研究主要以“职业教育+国际”“职业教育+开放”“职业教育+走出去”为主题词,并在上述网站中进行检索。经过政策筛选和政策细读,共整理出50项相关政策,政策颁布年份跨度为2004—2021年,政策来源及“职业教育对外开放”相关表述见表1。

通过整理和初步分析,本研究关注的职业教育对外开放政策主要类型为意见、工作要点、计划、办法、方案、公报、声明、通知、决定、规划、白皮书等,政策的具体数量和占比见表2。

我国职业教育对外开放政策内容主要围绕职业教育国际标准、职业教育国际合作、职业教育如何服务国家“走出去”、如何提升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影响力等内容,政策中的相关主题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具体如图1所示。

(二)政策文本分析工具

鉴于职业教育对外开放工作涉及的政策主体繁多、政策主体介入方式复杂等特点,本研究主要使用迈克尔·豪利特(Michael Howlett)和M·拉米什(M. Ramesh)提出的政策工具。该工具认为可以按照政府提供物品与服务的水平将公共政策工具放在一条以“完全自愿”和“完全强制”为两端的轴上,按照政府的介入程度分为强制性政策工具、混合型政策工具和自愿性政策工具^[8]。工具的具体内容和描述见表3所示。

(三)政策内容的主题维度

教育政策制定过程中有成千上万人参与,公

表1 我国职业教育政策中关于职业教育对外开放的表述(部分)

政策名称	职业教育对外开放政策相关表述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19—2021)	中方愿以促进就业、提升能力为目标,继续在非洲国家开展面向青年的减贫经验交流及小微型社会民生项目,推动更多非洲青年参与中非合作,将在非洲设立10个鲁班工坊,向非洲青年提供职业技能培训
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	鼓励引进国(境)外优质职业教育机构来华合作办学,促进国际经验的本土化、再创新
教育部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	注重培养与中国企业和产品“走出去”相配套的技术技能人才
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2019年工作要点	坚持“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服务“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提高职业教育对外开放水平
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	呼吁各国完善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和认证机制,加快推进本国教育资历框架开发,助力各国学习者在不同种类和不同阶段教育之间进行转换,促进终身学习社会建设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	支持承揽海外大型工程的企业与职业院校联合建立国际化人才培养基地
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	探索援助发展中国家职业教育的渠道和模式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级别视频会议联合声明	在人力资源开发、教育和职业培训方面加强合作,将增强民众应对疫情挑战的能力
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	面向其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国和非洲国家,提供更多人力资源、发展规划、经济政策等方面咨询培训,加强科技教育合作和援助
教育部 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整省推进提质培优建设职业教育创新发展高地的意见	服务企业“走出去”,按照国家部署加快推动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互通互认

表2 职业教育对外开放政策类型(2004—2021年)

文本类型	数量	占比	文本类型	数量	占比
意见	14	28.0%	双/多边声明	4	8.0%
工作要点	7	14.0%	通知	6	12.0%
计划	5	10.0%	决定	2	4.0%
办法	4	8.0%	规划	2	4.0%
方案	4	8.0%	白皮书	1	2.0%
联合公报	1	2.0%	总计	50	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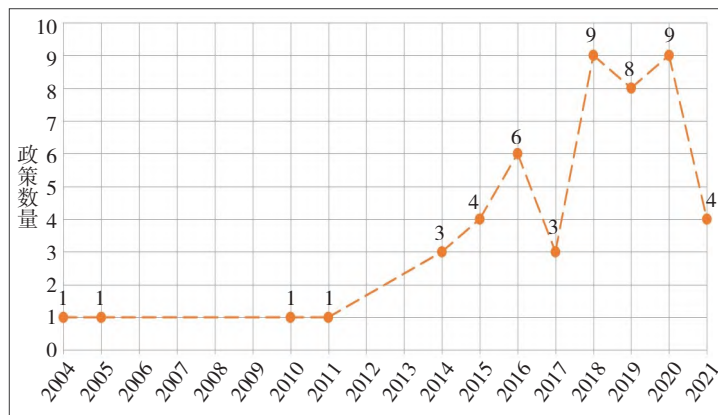


图1 职业教育对外开放政策颁布年份分布

表3 政策工具分类^{[9][10]}

工具类型	子工具内容	工具描述
强制性政策工具	规制工具	政府要求部分机构或个人履行一定行为的程序或行动方案,包括法律、规则、标准和特许等
	直接提供工具	政府直接履行职能,解决问题,包括财政拨款、直接向社会提供生产与服务、直接管理等
	命令性和权威性工具	机构设置和调整、政府机构能力建设、政府协定、指示指导、计划、命令执行、政策试验、政府机构改革等
混合型政策工具	信息与倡导工具	给予民众更多知识,使其能够遵照建议做出选择,包括信息的发布与公开、教育学习、舆论宣传、鼓励号召、呼吁、象征、示范、劝诫等
	补贴工具	政府主导下的由政府、私人、企业或组织提供的各种形式的财政转移,包括直接补助、财政奖励、税收优惠、政府贷款、赠款、实物奖励、利率优惠等
	税收工具	由个人或企业依法向政府支付,包括社会保险金、消费税、生产税、营业税、个人所得税以及使用者收费等
	契约工具	包括公私合作、服务外包等
	示范建设工具	包括社会声誉建设、示范带动建设、程序简化、利益留存、权力下放等
自愿性政策工具	家庭和社区工具	包括家庭互助、社区服务等
	自愿性组织工具	包括慈善组织等非营利性组织
	市场调节工具	包括市场自由化、市场竞争等

众对教育领域又极其熟悉,因此教育比任何公共政策领域中的权力都分散^[1]。因此,在利用豪利特和拉米什文本分析工具时,政策主体选择的强制性问题应该予以重视。本研究根据该政策分析工具的分类,按照政府各级部门的介入程度,将所收集的政策文本按“条”为最小单位,首先归入“强制性、混合型、自愿性”三大工具类别中。

另外,本研究主要以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为内容范围,将职业教育对外开放政策按照主题分为涉外办学、外籍人才引进、国际教育合作、职业教育标准互认、语言互通、境外招生就业、国际化人才培养、行业合作、技术物资援助、综合等类别。因此,基于政策工具的强制性程度与政策文本的主题,本文构建了我国职业教育对外开放政策的二维分布表,具体见表4。

从表3可知,本研究的50项政策共使用政策工具203次,其中强制性工具84次,占比41.38%;自愿性工具14次,占比6.90%;混合型工具使用次数最多,高达105次,占比51.72%。职业教育对外开放政策需要政府、高校、企业等多个环节联动,而混合型工具允许政府将最终决定权留给其他机构或部门的同时,可以不同程度地介入非政府部门的决策形成过程,混合型工具中的信息与倡导工具、示范建设工具恰能实现政策的方向和价值

引领作用。从政策工具类别维度来看,在职业教育对外开放进程中,需要通过各种政策来规范职业教育对外开放事业的发展,因此,强制性工具的占比也较高,保证了职业教育对外开放政策执行的效力。

从政策主题维度来看,“国际教育合作”是职业教育开放政策工具最常涉及的领域。“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和对外援助的政治理念,我国教育对外援助进入全面发展、合作共赢、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12]。这也使得“国际教育合作”成为政策工具使用最多的领域,使用次数为65次。与此同时,我国也采用各种政策促进落实职业教育办学,如“涉外办学”,并且也十分重视“行业合作”,但是对“语言互通”等主题的政策工具使用较少。

三、我国职业教育对外开放政策工具分析

由于二战后非洲国家独立、种族隔离制度废除等多种社会性原因,非洲职业教育的供给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存在不足。《非洲大陆技术与职业教育培训规划》(Continental Strategy for 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13]早就指出很多非洲国家的职业教育系统都存在资源短缺、技术设施陈旧破损、教育部门间缺少联系、缺乏劳动管理信息系统、课程短缺、人力资源短缺等问题。非

表4 职业教育对外开放政策工具主题二维分布

工具类别	政策主题											总计
	工具子类别	涉外办学	外籍人才引进	国际教育合作	职业教育标准互认	语言互通	境外招生就业	国际化人才培养	行业合作	技术物资援助	综合	
强制性政策工具	规制工具	3	-	1	16	-	-	-	1	-	3	24
	直接提供工具	16	1	4	-	-	-	2	1	7	-	31
	命令性和权威性工具	4	-	13	3	2	-	2	2	-	3	29
自愿性政策工具	家庭和社区工具	-	-	-	-	-	-	-	-	-	-	0
	自愿性组织工具	-	-	-	-	-	-	-	-	-	-	0
	市场调节工具	2	-	-	1	-	2	2	5	-	2	14
混合型政策工具	信息与倡导工具	7	2	26	1	-	-	9	3	1	3	52
	补贴工具	-	1	-	1	-	-	2	-	-	2	6
	税收和用户收费工具	-	-	-	-	-	-	-	-	-	-	0
	契约工具	10	-	17	-	-	-	2	8	-	2	39
	示范建设工具	2	-	4	-	-	-	-	2	-	-	8
合计		44	4	65	22	2	2	19	22	8	15	203

洲的职业教育呈现“社会地位低下、教育不平等、体系不完善、结构不合理、规模过小”等特点^[14]。在此背景下,面向非洲的职业教育对外开放政策应关注区域或国别差异,关注非洲各国职业教育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并积极为非洲职业教育治理贡献中国方案。我国职业教育开放政策较好地发挥了政策工具之间的协同作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非洲职业教育发展需求。

(一)发挥强制工具作用,促进职业教育现代化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援助经历了“侧重硬件援助,强调能力建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阶段^[15]。2010年以前,中非职业教育合作主要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比如,截至2011年,中国在安哥拉的教育投资约6.245亿美元,资金全部用于恢复教育基础设施及供应设备^[16],又如与刚果(布)的教育合作也多属于基础建设的援助^[17]。而在最近十余年以来,中非职业教育合作已走出单一的援助模式,这种转向在强制性政策工具中体现十分明显。

目前,很多非洲国家电信和网络服务的分布和质量仍旧不均衡,学生接入服务成本高昂。另外,新冠肺炎疫情也给非洲职业教育带来严重打击,仅在肯尼亚就有逾40万名学生被迫中止了学习^[18]。《非洲就业提升公报2021》(Africa Creates Jobs 2021 Communiqué)^[19]也建议非盟成员国国家应尽力开发可以远程接入职业教育资源的数字学习方案,以便为偏远地区学习者提供获得职业教育资格认证的条件,而中国也积极对非开展除基建之外的职业教育技术援助。

除此之外,“直接提供工具”中还包括“涉外办学、外籍人才引进、国际化人才培养”等主题工具,其中“涉外办学”次数最多,共16次,具体如“开展国际职业教育服务,承接‘走出去’中资企业海外员工教育培训,建设一批鲁班工坊,推动技术技能人才本土化。在吉布提、埃及等国设立‘鲁班工坊’,由中国职业教育学校对口建设,为当地青年提供实用技术培训”。实际上,“鲁班工坊”等职业教育品牌项目是我国职业教育对外开放中的重要环节,始终以各个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发展为职业教育的发展基点,如《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19—2021)》提出将在非洲设立10个鲁班工

坊,向非洲青年提供职业技能培训,2021年的《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白皮书中也指出援布基纳法索职业培训中心技术援助极大地激活了当地职业教育市场。以上数据均表明我国职业教育已经在“走出去”工作中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走出了单纯的基础建设援助模式,并极大地促进了非洲国家职业教育的现代化进程。

(二)健全规制工具体系,探索职业教育标准化

除技术物资援助外,中国还积极推进职业教育标准、教育模式等方面的交流合作,这在“强制性工具”中的“规制工具”使用上体现得较为明显。规制工具可以是政府要求一部分个人或机构履行一定行为的程序或行动方案^[20]。在职业教育领域,规制工具主要指各级政府和教育部门颁布的规则、标准,以及对教育体系的建设、调整和监督政策等。

不少非洲国家的职业教育体系和改革仍受到前殖民国的深刻影响,如安哥拉的职业教育改革设计和实施都直接从葡萄牙方面获得建议^[21],莫桑比克也以殖民时期的职业教育体系为基础^[22]。因此,非洲国家亟需建设先进、完善的职业教育体系和标准,而非盟也敦促成员国国家尽快开发非洲职业教育与技能发展系统的标准^[23]。

从本研究的政策文本看,国务院以及各部委颁布的政策中鼓励各职业院校“积极参与制定职业教育国际标准、扩大专业教学标准、开发国际合作”,山东省、甘肃省等省市教育厅已经就如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职业教育体系进行政策沟通,如,2020年的《教育部 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整省推进职业教育发展打造“技能甘肃”的意见》中指出“建立分段合作培养新模式,探索推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通互认,为‘走出去’企业、合作国家(区域)培养国际化技术技能人才”。应更深入研究非洲各国职业教育体系和标准等方面的政策,以优化面向非洲国家的职业教育政策互通工作。

(三)多样化混合型工具,构建职业教育生态链

职业教育与行业机构的脱节是非洲职业教育发展进程中的一大困境。近年来,非洲职业教育领域尤其期待与行业的合作。非洲国家意识到加强职业教育与产业联系,以及以就业市场需求为

准绳进行职业教育的必要性^[24]。《非洲发展动态 2021》(Africa's Development Dynamics 2021)^[25]也强调职业教育机构需要加强与民营企业的合作,如乌干达的一项研究显示由于民营企业具备较好的技能和在职培训,因此职业教育机构和民营企业的合作会带来更为高效的服务,但是在不少东非国家,职业教育机构仍较少与民营企业形成合作关系。

而我国在职业教育“走出去”进程中关注职业教育的办学、招生、培养和就业等完整生态链,十分重视与当地企业及机构的合作,主要体现在“契约工具”和“信息与倡导工具”。在“契约工具”中,主要涉及行业合作、国际教育合作、涉外办学等主题,如“支持承揽海外大型工程的企业与职业院校联合建立国际化人才培养基地”“鼓励境内外资本、机构、企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要求,积极参与职业教育中外合作办学”。在“信息与倡导工具”中,主要包括职业教育对外开放政策的发布和公开,对职业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宣传,对职业教育对外开放观念的鼓励和号召等工具,如“鼓励国家开放大学建设海外学习中心,推动中国与产能合作国远程教育培训合作”“鼓励职业院校配合企业走出去,多方筹措境外办学经费,通过共建海外院校、特色专业、培训机构等方式,为当地和我国培养急需的应用型技术技能人才”。以上政策工具使得职业教育对外开放政策可以覆盖非洲职业教育多个环节中面临的困难。在我国职业教育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和市场力量是职业教育“走出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比如,新时期的中国—刚果(布)教育合作也不再仅限于援建校舍,而更加重视社会力量的协同,发挥学校、企业合作联动效应^[26]。非洲其他国家亦是如此。

除此之外,混合型工具中还使用了示范建设工具,如“以‘一带一路’为重点,打造以‘鲁班工坊’等为代表的品牌项目,探索与中国企业和产品‘走出去’相适应的模式”,积极打造中国职业教育品牌,优化中国职业教育的海外形象。

(四)凸显市场工具效用,提升职业教育认可度

目前,不少非洲国家都面临职业教育与就业市场严重脱节的问题,职业教育的就业环节非常

薄弱,这严重影响了非洲职业教育的认可度。据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Gallup World Poll)的数据显示,东非受过中等和高等教育或以上的人的失业率(分别为15%和19%)要高于没有受过教育或仅仅受过基础教育的人(12%)^[27]。《非洲就业提升公报 2021》^[28]指出,增加职业教育的吸引力是提升就业的关键和必要因素,非盟成员国也应与其他全球公认的技术与职业教育机构合作,以改善职业教育在当地的形象。

从政策工具小类上看,自愿性政策工具中的市场调节工具在提升职业教育认可度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共计14次,其中多为“行业合作、境外招生就业”等主题工具,如“推动与中国企业和产品‘走出去’相配套的职业教育发展模式,注重培养符合中国企业海外生产经营需求的本土化人才。积极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职业教育合作,为当地培养交通运输类技术技能人才。发挥职业院校专业优势,配合‘走出去’交通运输企业面向当地员工开展技术技能培训”。目前,市场调节工具的使用可促进非洲国家的就业,增加职业教育学生的就业机会,亦可间接地提升非洲民众对职业教育的认可度。另外,与当地企业的行业合作亦能为当地学生提供真实的实践场所,增加实习实践机会。

四、我国对非洲职业教育开放政策展望

近年来,教育部一直将扩大教育对外开放作为重点工作任务,加强国别和区域研究,积极参与教育领域全球治理。2020年,教育部等八部门颁布《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开启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教育对外援助新篇章。2021年教育部工作重点中指出应推进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并出台《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工作计划(2021—2025)》。在此背景下,我国职业教育的对外开放工作取得了长足进展,我国与非洲的职业教育合作也在逐步拓展,合作领域和方式也更加多样化,但是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面临未来的挑战。

(一)提升强制工具精度,贡献中国方案

从目前政策工具的使用情况看,相关部门可积极开发“职业教育标准互认”等主题工具的使用,如“共商共建区域性职业教育资历框架(《推

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以推进“中国模式、中国方案”,提升我国职业教育的国际影响力。我国在职业教育师资培育、实习实践基地建设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如凭借地缘优势,云南、广西、广东和福建等省份职业教育资源可较好地辐射东南亚地区,打造了优秀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样板。但是,目前我国职业教育对外开放政策工具的统一性较高,对于不同区域和国别的政策针对性较弱。未来对非洲的职业教育对外开放政策应着重参考区域与国别研究领域的成果,应从非洲各国实际情况出发,注重了解非洲职业教育的现状以及面临的问题和困境,提升政策工具的精准度,方可在教学模式、职业教育标准、职业教育资源、实习基地建设、产教融合等方面贡献“中国方案”。

(二)平衡政策工具特性,创造就业机会

与普通教育相比,职业教育与产业距离更近,其培养模式和培养质量直接体现在就业市场上,“为当地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应成为职业教育对外开放重点指标之一。但是,据研究,目前中国资助以及中非合作的项目只能带动较少的就业机会,而且很多非洲国家官员担心中方工人会替代当地的工人,削减当地民众的就业机会^[29]。在职业教育对外开放政策选用时,应充分考虑不同工具的特性,如可协调使用强制性工具和自愿性工具,但是目前与就业主题相关的政策工具多为自愿性,且数量较少。市场工具也应辅以其他工具,出台保护企业和从业者利益的政策法规,或通过提供补贴的方法鼓励职业教育产学合作等,以此作为市场工具的补充。

职业教育涉外办学机构应重点关注非洲各国产业需求,加强职业教育与中国企业以及当地企业的合作,盘活当地可用职业教育就业资源。未来在政策工具选择上,应增加强制性政策和混合型政策的使用,另外,也应吸引非洲当地主体参与政策的执行,充分发挥政策主体的作用。

(三)拓展政策工具主体,落实语言互通

语言互通是“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重要方面,也是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基础^[30]。国际中文教育和职业教育是我国教育领域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31],而近年

“中文+职业技能”也成为职业教育开放事业中的工作重点。我国与非洲国家在教育文化领域的交流合作往往需要“语言+专业”的复合型人才,其中“中文+职业技能”复合型人才尤其紧缺,如安哥拉内图大学孔子学院为安哥拉移民局、犯罪调查局、国家警察局等部门员工开设汉语培训课程^[32];中国和莫桑比克之间的教育交流合作也为该国本土教师和翻译等职业人员提供有针对性的职业教育与培训^[33]。但是,大部分非洲国家的中文教育正处在刚刚起步的状态,“中文+职业技能”教学资源也处在稀缺阶段,而非洲属于教学资源“薄弱型”区域,教学资源资助研发能力不足,资源的使用规模偏小^[34]。未来或可重点建设相关教学资源,而在此过程中,可进一步拓展“语言互通”等政策工具的政策主体,吸收普通教育、民间教学机构等教学和科研资源。

2019年8月,海上丝路孔院(与天津师范大学合作)与大城技术学院、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联手打造的“汉语+”项目,海上丝路孔院负责为“鲁班工坊”项目师生提供基础汉语以及专业汉语的培训。这说明我国高等院校的中国语言文学类专业在中国职业教育对外开放政策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同时,本科院校中国语言文学类专业也可开展“中文+职业技能”研究、教学和推广工作,如加强“中文+职业技能”相关的语体研究。但是目前在我国职业教育对外开放过程中,对“语言互通”这一“政策互通”的先决条件并没有使用较多的政策工具,更多由各个高校自发展开,未来可增加此类强制性工具。

参考文献:

- [1]廖思傲,牛长松.非洲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困境与中非职业技术教育合作[J].世界教育信息,2019(24): 51-57.
- [2][31]教育项目研究所.构建“中文+职业技能”教育高质量发展新体系[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1(12):119-123.
- [3]陈莹.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中国国际教育援助[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11):119-132.
- [4]非洲联盟委员会.非盟2063年议程的第一个十年执行计划[EB/OL].(2021-04-21)[2022-07-

29].<https://www.yidaiyilu.gov.cn/wcm.files/upload/CMSydlgw/202104/202104210436015.pdf>.

[5]African Union Commission. Agenda 2063: the Africa we want[EB/OL].(2013-06-10)[2022-07-29].https://au.int/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36204-doc-agenda2063_popular_version_en.pdf.

[6]Depart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Training. Post-schoo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monitor: macro-indicator trends[EB/OL].(2021-03)[2022-07-29].<https://www.dhet.gov.za/Planning%20Monitoring%20and%20Evaluation%20Coordination/Post-School%20Education%20and%20Training%20Monitor%20-%20Macro-Indicator%20Trends%20-%20March%202021.pdf>.

[7]Depart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Training. Revised strategic plan: 2020-2025[EB/OL]. [2022-07-29].<https://www.dhet.gov.za/SiteAssets/Planing.Policy%20and%20Strategy/DHET%20Revised%202020-2025%20Strat%20Plan%20.pdf>.

[8][9][20]迈克尔·豪利特, M·拉米什. 公共政策研究: 政策循环与政策子系统[M]. 庞诗, 等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6: 141-173.

[10]车峰, 孙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工具[J]. 现代教育管理, 2016(3): 65-69.

[11]刘世清. 教育政策伦理[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0: 17.

[12][15]徐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援助的政治理念与实践策略[J]. 比较教育研究, 2021(8): 21-29.

[13]Africa Union Commission. Continental strategy for 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EB/OL].(2018-12-22)[2022-07-29].<https://edu-au.org/category/14-au-tvet-strategy>.

[14]陈明昆, 张晓楠, 李俊丽. 中国对非职业教育援助与合作的实践发展及战略意义[J]. 比较教育研究, 2016(8): 1-6.

[16][21][32]张方方, 李丛. 安哥拉文化教育研究[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21: 165-262.

[17][26]王吉会, 车迪. 刚果(布)文化教育研究[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21: 197-199.

[18]African Union Commission. Africa educa-

tion innovations handbook 2020[EB/OL].(2021-01-12)[2022-07-15].<https://au.int/en/documents/20210112/africa-education-innovations-handbook-2020>.

[19][23][28]African Union Commission. Africa creates jobs 2021 communique[EB/OL].(2021-11-04)[2022-07-15].<https://au.int/en/documents/20211104/africa-creates-jobs-2021-communique-04-november-2021>.

[22][33]朱睿智, 杨傲然. 莫桑比克文化教育研究[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21: 126-190.

[24]Call for expression of interest (EOI) continental TVET expert-advisory group[EB/OL].(2017-05-29)[2022-07-19].<https://au.int/en/announcements/20170529/call-expression-interest-eoi-continental-tvet-expert-advisory-group>.

[25][27]AUC/OECD. Africa's development dynamics 2021: digital transformation for quality jobs[M]. Paris: OECD Publishing, 2021: 177-179.

[29]LIN J Y, WANG Y. Going beyond aid: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for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154.

[30]魏晖. “一带一路”与语言互通[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4): 43-47.

[34]马箭飞, 梁宇, 吴应辉, 等. 国际中文教育教学资源建设70年: 成就与展望[J].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6): 15-22.

